

共话时政

十七大热点通俗读物

丛书主编：邢贲思 副主编：易冰

新阶段 · 新起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和新的阶段性特征

王向明 著



人民出版社

共话时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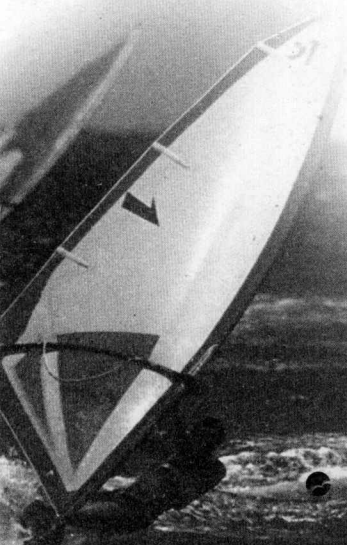
十七大热点通俗读物

丛书主编：邢贲思 副主编：易冰

新阶段 · 新起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和新的阶段性特征

王向明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侯俊智

封面设计:周文辉

版式设计:陈 岩

责任校对:宋春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阶段·新起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新的
阶段性特征/王向明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

(十七大热点通俗读物)

ISBN 978-7-01-006776-6

I. 新… II. 王… III. 中国-概况-学习参考资料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0901 号

新阶段·新起点

XINJIEDUAN XINQIDIAN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新的阶段性特征

王向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3.875

字数:60 千字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 978-7-01-006776-6 定价:7.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出版说明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根据中央关于“宣传贯彻十七大精神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善于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数字说话”的要求，我社特组织编写了《十七大热点通俗读物》丛书，邀请众多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针对干部群众学习贯彻过程中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用“一题一书”的形式进行阐释与讲解，每本书篇幅简短精练，观点准确，力图做到形式活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成为广大基层干部群众、青年学生进一步学习领会十七大精神的重要读本。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

——摘自党的十七大报告

目录

CONTENTS

一 挥洒黎明的曙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 /001

二 太阳刚刚升起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含义 /019

三 站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最大的实际 /037

四 长征不怕路途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 /061

五 新世纪的进军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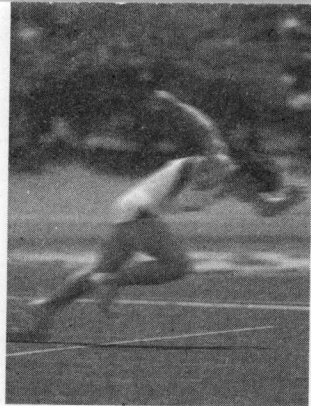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特征 /077

六 奏响辉煌的乐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095

主要参考文献 /111

后记 /112



—

挥洒黎明的曙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



人类社会从远古走到今天，从荒蛮走向文明，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正确认识和科学划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是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的基本方法之一。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回首中国革命的峥嵘岁月，我们既有过高歌猛进的辉煌灿烂，也有过坎坷曲折的挫折失败，而这一切都与我们能否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处的具体历史阶段息息相关。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非常重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他曾深刻指出：认清“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我们党正是科学地分析了当时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实际国情，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个阶段即以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为中介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革命方略。在这一路线的指导下，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走过了荆棘丛生的万水千山，中国共产党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国情，带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终于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新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进步的新纪元。

但是，与马克思对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最初设想不同，中国革命的成功，不是在经过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以后才进入社会主义的，而是在经济文化都相当落后的基础

上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这是中国革命的特殊性。

“大难甫平，民生憔悴。”当庆祝新中国成立的礼炮鸣响时，中国人民却不得不面对旧中国遗留的千疮百孔。千年的封建统治和百年的帝国主义侵略留给了我们一个极其贫穷落后的中国。建国时我国民族工业极度落后，只集中在上海、天津等极少数城市且规模小得可怜，全国最大的汽车修理厂也不过有几百名员工。1949年，我国的钢铁产量仅有15.8万吨，标准煤产量2374万吨，全年发电量只有43亿千瓦小时，羸弱的工业相对新生共和国的巨大需求，只是杯水车薪。农业状况亦不容乐观，土地大量荒芜，水利设施缺乏，农业生产力落后，许多地区依然延续着几千年前那种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1949年，我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9.4%，粮食总产量却只有1.132亿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5亿多中国人民连最起码的温饱都没有保障。卫生医疗条件同样堪忧，1949年我国人民平均寿命只有35岁。

衡量一国综合国力的指标有哪些？

1. 资源：通过所拥有资源数量来表示国力。这是一国赖以生存、发展的先决条件。资源主要由人力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土地资源构成。
2. 经济活动能力：通过一个国家在其资源的基础上能达到的生产和财富水平来表示一国的国力。一个国家的经



济活动能力又可分为经济实力（总量、人均量）、生产效率、物耗水平及经济结构等四个方面。

3. 对外经济活动能力：通过一国所能达到的其资源在国际间的“最优配置”水平来表示国力。它要受资源条件、产业结构、经济及科技发展阶段制约。

4. 科技能力：科技上的竞争，已是现代综合国力竞争的基础。

5. 社会发展程度：通过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彼此协调来表示一国的国力。

6. 军事能力：一个国家需将一定的人力、物力用于国防建设。它是社会必需的部分，它对内起保证建设、对外起抵御侵略的作用，是一种以“威慑力量”存在的国力。

7. 政府调控能力：以政府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水平来反映一国的国力。

8. 外交能力：在国际交往中的威望及调解国际冲突的能力。弱国无外交，所以外交能力也和科技能力一样，是国力在更高层次的表现。

对于中国社会当时严峻的实际状况，“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进京”前夕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当时的基本国情，根据我国工农业落后的实际，确定了进入城市后党的工作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心。毛泽东并且指出，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至少需要“二三十年时间”。正是由于对当时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正确判断，中国共

政党在建国初期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以土地改革、调整工商业、“三反”、“五反”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改革。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获得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1952年，工农业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均已超过建国前的最高水平，人民生活也得到改善。同1949年相比，1952年职工工资提高70%，农民收入增长30%，工业总产值增长77.5%。在经济恢复的同时，经济结构也得到调整，国民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都得到发展。由于国家的支持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国营经济发展尤为迅速。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此基础上，中央制定并开始实施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并在1956年顺利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此，一个初步走向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完全是因为党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国情，制定并坚持执行了符合社会发展阶段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对这一阶段的发展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总结。1957年初，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这就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建成社会主义二者区别开来，说明社会主义有一个成熟程度不同的发展过程，可以区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也为后来我们党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供了启发性的意见。

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为一个自然史的历史过程，难免会出现曲折和坎坷。由于我们党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对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还不够丰富；又由于建国初期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我们逐渐失去了应有的谨慎，一种对社会主义建设盲目乐观的情绪在渐渐产生。从而，毛泽东最早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没有能够坚持和得到进一步发展。相反，列宁早就批评过的共产主义的“左”派幼稚病却悄然感染到了进入社会主义还时日甚少的中国共产党身上。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提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了。”这就不仅完全抹杀了社会主义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完全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建立

在对社会生产力的严重错误估计基础上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了。由于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矛盾进一步激化,使生产关系越来越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无疑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

“大跃进”时期脱离国情的激进口号

“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

“开展小麦双千斤县、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积丰产田、万斤高额丰产田运动”。

“掀起一二五运动”(即日产一万吨铁、二万吨焦、五万吨矿石、十万吨煤)。

“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

“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主观能动性无限,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

“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倾家荡产大搞钢铁”。

“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三天实现超声波化”。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尝试受挫后,毛泽东反思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对我国所处的社会阶段问题,也重新给出了答案。在1958年11月至12月

的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那种企图不经过发展经济而在条件不成熟时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跳入共产主义的空想，提出要划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界限。他认识到，实现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要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要经过相当长和相当复杂的过程。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论述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时，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概念。在1959年底至翌年初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他说：“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毛泽东的这些论断，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但是，毛泽东的这些具有创见性的思想却没有能够继续坚持和发展下去。特别是在出现了1956年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浪潮和匈牙利事件，以及国内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关于我国社会矛盾与阶级斗争问题上出现了错误的认识，并直接导致了他对我国社会所处阶段的认识也发生了严重混乱。整个党的指导思想不断向“左”倾斜，对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政策的制定忽视了中国国情、逐渐偏离了中国

的实际。

这一系列错误的继续发展，终于酿成了从 1966 年开始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的“左”的错误。这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

悬崖勒马，痛定思痛。“文化大革命”这个全局性错误的理论根源，就是没有正确认识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错误地估计了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主要矛盾。其实，早在 1956 年党的八大就已经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分析，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它决定了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的保护下发展生产力，创造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但其后我们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完全背离了这个正确判断，错误地认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搞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最终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邓小平在后来曾直率地说



过，毛泽东“有一个重大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这里所说的方法不对头，主要是指超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搞所有制的不断升级和用以阶级斗争为纲促进生产力发展，也就是对基本国情的错误认识和对实际情况的偏离。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们过去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忽视了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经济效果和各项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从而造成大量的浪费和损失。

——摘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978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深刻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彻底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随后进行的全面拨乱反正中，我们党深切地认识到，“清醒地认识基本国情，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极端重要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邓小平就提出，底子薄、人口多、生产力落后，这是中国的现实国情。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